

试析《汉书·五行志》撰述对正史编纂的影响

赵宜聪

(开封市博物馆 社会教育部, 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自《汉书》后,《五行志》作为重要材料在正史编纂时编入史籍,参照《尚书·洪范》篇与《汉书·五行志》体例。后代史家对《五行志》作为正史多有杂驳之意,统治者鉴于《五行志》宣扬皇权天授的思想,多对此志采取褒扬的态度。从汉代以降政治思想的不同时代背景出发,结合历代正史与史学评论家所作评述,系统理解《五行志》史学史意义,梳理史料与史家研究观点,以期探讨《汉书·五行志》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汉书·五行志》;二十四史;考索;编辑撰写

中图分类号:K280.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891(2020)3-0039-04

0 引言

《五行志》为《汉书》十志之一。《五行志》引证“洪范大义”与“春秋灾异”之事,加以汉儒详于考究灾异、福祸、方术用以阐述阴阳五行之说。班氏撰修此志,开历代正史五行、祥瑞志先河,认识与研究《汉书·五行志》对更好地把握西汉文化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汉书·五行志》撰述后历代褒贬不一,但鉴于统治者热衷于《五行志》阐发五行大法,正史与史家多对该志有所裨益。本文即以历代正史、史家研究为论述基础,结合时代背景、学术特色等因素,探讨《汉书·五行志》的价值与意义,寻绎潜藏于此志之中的政治意涵。

1 讖纬思维下的《汉书·五行志》

《后汉书·五行志》所收仅为东汉一代灾异事例,在灾异架构和叙事的方法上大体沿用了《汉书·五行志》“灾”与“应”相结合的形式,所撰各类灾异的类型仅对《洪范·五行传》所记稍作调整。^{[1]3365-3366}范晔在各篇章下又增加新的灾异类型进行撰述,而对于东汉儒生阐述灾异的方法和取向与班固征引治灾方式并未有过多的变化,皆以《汉书·五行志》中运用灾异和经传之说来说彰显汉代政权的合法性,其目的仍是为汉家政权立正统之法。《后汉书·五行志》中刘向“洪范五行说”和“京房易传”解灾异的方式的运用与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使用更加广泛。^{[2]291}因东汉时期存在今古文学之争,致使刘向所述灾异中掺汇有大量讖纬材料,利用《左传》重新解读《汉书·五行志》所引灾异的合理性,成为《后汉书》治灾异又一大特色。

范晔作《后汉书》借鉴了十种汉晋史家所著“后汉史”,《后汉书·五行志》用司马彪《续汉纪》“八志”中《五行志》六篇作为该志撰述依据。司马彪《续汉书》“八志”被后世称为“王教之要,国典之源,桀然略备,可得而知矣”。^{[1]1231}司马彪著述《五行志》目的为强调以“君威”“臣仪”“上下有序”为核心的“礼制”等级秩序,是为适应东汉后期门阀制度下,士大夫掌权提供合理依据。《后汉书·五行志》引述阐释灾异的汉儒有应劭、蔡邕、谯周、李固等,这些儒生多为门阀贵族出身,其阐发多与西汉灾异所主张的“天人感应”和“匡正汉氏”的思想相驳。范晔编纂《后汉书·五行志》继承了班固撰述该志的目的,是对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灾异材料的整理和对该志史事评论的审定。

《后汉书·五行志》后,因《三国志》没有志书,沈约的《宋书·五行志》成为南北朝时一部关于灾异的重要史料。^{[3]879}沈约作《宋书》是奉诏编撰,所引征史料较广,加之《宋书》志书内容在数量上几乎占全书一半,使得该志是继司马彪《续汉书》“八志”后的重要灾异史料。沈约与班固、范晔有相同之处,《宋书》撰述《五行志》也是在前人旧稿基础上的重新整理。宋文帝时期,何天成以著作郎身份撰修《五行志》,目的在于续修司马彪

收稿日期:2020-03-16

作者简介:赵宜聪(1991—),男,河南开封人,开封市博物馆社会教育部助理馆员,硕士。

《续汉书》。《宋书·五行志》记载魏晋两百多年灾异之事,对魏晋记述的灾害甚详,但对刘宋时期灾害记述较少。《宋书·五行志》以“五行”“五事”“五庶征”合并在一起,体裁虽与《汉书·五行志》差别不大,但分类更加具体,与《汉书·五行志》最大不同在于《宋书·五行志》记述灾异已不再和汉儒附会阴阳五行之说相较,志中仅有部分“事应占语”来阐释灾异学说,但已失去价值。沈约《宋书·五行志》序曰:“凡已经前议者,并即其言以释之;未有旧说者,推准事理,以俟来者。”^{[3]882}《宋书·五行志》的编纂已成为只记灾异,不在记述当朝灾异家阐释之说,这种形式影响到后史《五行志》的创作。

2 史学繁盛下的《汉书·五行志》

唐代开史馆编修史志,以历经十六年编纂成书的《五代史志》成就最高,该书因附于《隋书》之后,又被称为《隋志》。作为唐王朝主编的官方志书,该书是自《史记》八书、《汉书》十志后,又一重要的史志著作。《隋志·五行志》综合囊括了自汉末到唐初四百多年阴阳五行之事,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行志》撰述的一次系统性总结成果。^{[4]617}《隋书·五行志》序曰:“《易》以八卦定吉凶,则庖牺所以称圣也。《书》以九畴论休咎,则大禹所以为明也。《春秋》以灾祥验行事,则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示废兴,则甘、石所以先知也。足以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讹之占所以征验。”^{[4]620-621}《隋书·五行志》依据《宋书·五行志》撰述方式进行分门别类。其体裁继承了前代作《五行志》的经验,广泛引用《洪范五行传》来阐释灾异说,虽引例完整但与《汉书·五行志》当中的“传”“说”不同,主要依照唐人之意用以变化。《隋书·五行志》共分两卷,上卷阐述“五行”“五事”,下卷阐述“五庶征”,虽是对《汉书》的继承,分类看似详细,但结构上却存在混乱和复杂。^{[5]1-6}《隋书·五行志》未列符瑞志,增加了不少新的灾异类型,如云阴、木冰、木金水火二沴土等类型,这些灾异是前代《汉书》《后汉书》《宋书》五行志所不具备的。

《晋书·五行志》共撰三卷,唐贞观年间,依据南齐人臧荣绪所作《晋书》为蓝本,采纳众家晋史进行撰定的。其序曰:“综而为言,凡有三术。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辅克忠,万物咸遂其性,则和气应,休征效,国以安。二曰,君违其道,小人在位,众庶失常,则乖气应,咎征效,国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见灾异,退而自省,责躬修德,共御补过,则消祸而福至。此其大略也。”^{[6]799-800}《晋书·五行志》与《汉书·五行志》和《后汉书·五行志》的结构相互融合,强调君治以道,休征效,国以安;君违其道,咎征效,国以亡;人君大臣见灾异而责躬修德,这三条也是两汉书《五行志》所加以强调的内容。《晋书·五行志》列魏文帝黄初以来五行灾异,加之因《三国志》无志,实际在撰书时也对三国时期的灾异之事加以记述。

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幾撰写的《史通》一书,其外篇中有《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文章^{[7]397,409},对《汉书·五行志》进行了批评和论证。《史通》中《汉书五行志错误》曰:“《太史公书》自《春秋》以前,所有国家灾眚,贤哲占候,皆出于《左氏》《国语》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厉,下至鲁之定、哀,而不云《国语》,唯称‘史记’,岂非忘本徇末,逐近弃远者乎?”^{[8]411-412}刘知幾认为班固的《五行志》舍弃正确的观点而采用错误的说法,摒弃《洪范》《春秋》旧说而沿袭汉儒的新解,解经标新立异,夸耀自身知识渊博。刘氏把《五行志》中的疏误谬缺,条分并归为引书失误、叙事乖理、释灾多滥、古学不经四类,运用文献学的方法指出五行志灾祥的应征和附会,逐例进行辨析。刘氏批判班固并未有远见的卓识,也不遵循经典的说法,而是受到社会上纷杂学术的影响,由自己的主观意识进行阐发。刘知幾批判《汉书·五行志》中刘向、董仲舒等人关于灾异所做的占验都是牵强附会之说,并从东汉初期的政治形势、时间关系、自然科学等方面提出驳论。刘氏对班固《五行志》的批判受其自身提倡会通史学的影响,所列条目和举例难以信服,举例多存谬误之说,并未对《汉书·五行志》进行客观评价。

3 理学史观下的《汉书·五行志》

宋代因儒家思想趋于理性,作为主要阐述“天人合一”思想的《汉书·五行志》学术地位不断下降,研究多出批判性观点。苏轼应试时作《洪范五行传》对洪范大法的合理性做出论证。^{[9]144}王安石的《洪范论》试图运用理性的观点来抒发灾异思想,以“自然之说”“天下之正理”重新对《洪范》所记五行和五事之法进行梳理。^{[10]78-79}由于宋代理性思想的发展,刘向所作《洪范五行传》与班固所创《汉书·五行志》被宋儒作了新的阐发,观点已与原说不同。宋代治史对《唐书》《五代史》中《五行志》部分进行创作时,不同于唐代注重两汉书的

体例,转变为只记述灾异不再对灾异加的阐发进行记述。

宋仁宗赵祯撰述《洪范政鉴》一书,在内容上采用儒道两家推演之说,构建复杂的“天人一体”思想,依据五行对撰文进行分类,征引《汉书·五行志》中春秋与西汉时期各种灾异的“休证”和“咎证”,以自然之中的灾异变化与天象和帝王的言行、朝代的兴衰相附会。^{[11]13}赵祯撰述此书目的是告诫子孙要承天子之责民心存敬畏,奉天行道,注重自身修德,才能实现赵氏王朝江山社稷稳固的目的。

宋代对《五行志》的研究已经不同于唐代之前对《洪范》及《春秋》经进行说解。郭茂倩对《汉书·五行志》与刘向《洪范五行传》进行辑佚,通过对《五行志》五事事例的整理及将汉武帝至王莽时期民间流行的歌谣、谚语收入到《乐府歌集》与《杂歌谣词》之中,对歌谣与谚语和乐府诗歌进行比勘。^{[12]226}

4 朴学经验下的《汉书·五行志》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对《汉书·五行志》论体进行点评,曰:“《五行志》先引经曰一段,是《尚书·洪范》文;次引传曰一段,是伏生《洪范五行传》文;又次引说曰一段,是欧阳、大小夏侯等说,乃当时列于学官、博士所习者。以下则历引《春秋》及汉事以证之,所采皆董仲舒、刘向、歆父子说也。而歆说与传说或不同,志亦或舍传说而从歆,又采京房《易传》亦甚多。今所传京氏《易传》中皆无之,则今所传京氏《易传》,已非足本。间亦采眭孟、谷永、李寻之说。眭、谷语略皆见其传中,寻说则传无之也。”^{[13]72}其文内容对《汉书·五行志》中“五行”“五事”“皇极之说”加以概括,对该志的著述方式、引文特色与采用的主要汉儒观点进行了论述。王鸣盛评价《五行志》较前人刘知幾等较为客观,认为该志有得有失。但王鸣盛错误地认为伏生作《洪范》而流传,该文实则为商末箕子所做。所论错误观点认为,解经汉儒为“欧阳、大小夏侯等说”,实则应是刘向、刘歆、董仲舒之言。可见,王氏并未详读《五行志》,只是希望通过汉儒灾异说对诸儒灾异论著进行比较,重树不同于前人的观点。

清人陈直所撰《公羊义疏》以东汉何休解诂为基础,引用“三礼之说”和董仲舒“公羊之学”,对古代君王礼制考述甚详。^{[14]49}陈直治书严谨,恪守何氏《公羊》之义。论及三科九旨、灾异之说,西汉儒家治灾异加以用朴学的方法进行疏解,不刻意穿凿,详论诸家治《公羊传》阐大一统之说。书中序文曰:“臧琳谓公羊言新周,核之董说则以天意,以乐器空存无补实政,故灾之而望周之从新,圣人书之所以承天意也。”《公羊义疏》引用《五行志》中春秋灾异加以详述,考证王法之道,立春秋大义。

清末文献学家王先谦作《汉书补注》,整理自唐颜师古之后七十多家《汉书》注疏。王先谦补注《五行志》征引明、清学者考据之说,引述者主要有王念孙、齐召南、周寿昌、朱一新、苏舆等学者。^{[15]4-5}王氏对明代士大夫重新重视“汉学”的思想加以利用,将前代学者对汉唐注疏的成果与经学本义的矫正引证到《补注》之中,又以清代实学之风围绕《五行志》所做的记忆与研究进行整理。博采众家之说,从多角度发掘《五行志》所蕴含的学术价值,以期还原明清治经学之特色。

清代在《汉书·五行志》研究上以考证与校订方面的成就最高。因乾嘉时期学风的影响,学者用《五行志》来辨析《春秋》今古异文,强调今古文家法之区别。陈寿祺在《左氏文海》记:“《五行志》多三传先师之说。”^{[16]129}可见,陈氏把《五行志》定位于诸经本意。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等书中,都引用或阐述《五行志》所记内容,以期还原各经本意。因在《五行志》征引董仲舒治《公羊传》、刘向治《穀梁传》、刘歆治《左氏传》,清代学者在对诸经考订时,多引述各经解者之言。沈钦韩《汉书疏证》、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王鸣盛《尚书後案》在对经文注解时皆征引汉儒诸家之说。清代学者以何休所作《公羊注》与董仲舒阴阳灾异说、范宁所作《穀梁注》与刘向祸福灾异说,加上《说文》《五经异义》之中刘歆的《左氏》之说加以对比,探讨西汉经学与后世经学的差异。

5 结束语

汉代以降经历了数次政治思想大变动,用以撰述春秋、西汉灾异的《汉书·五行志》所阐发的政治大法、五行大律,随着西方文明的东传被定为迷信、封建的古代思想糟粕。《五行志》虽在古代成为君王安邦定国的政治理论用以阐发君权神授思想,但因正史“五行”多把朝代更替、君王失德的行为附会至志书所记灾异之中,使得统治者在撰修《五行志》时,常使其阐发灾异转为自身附会,改变了志书本身的客观性,但保留了当

时政治思想与史事,使《五行志》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献材料的丰富宝库。史学家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对客观现实进行描述,并加以主观分析,把史料与政治相结合,使得《汉书·五行志》成为历代统治者维系王朝统治的政治参考。

参考文献:

- [1]范晔.后汉书[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张文智.孟焦京易学新探[M].济南:齐鲁书社,2013.
- [3]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5]游自勇.试论正史《五行志》的演变[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6.
- [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刘知幾.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8]刘知幾.史通评注[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 [9]苏轼.苏轼集[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
- [10]王安石.王安石集[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 [11]赵祯.洪范政鉴[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 [12]郭茂倩.乐府诗集[M].聂世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1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 [14]陈立.公羊义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15]班固.汉书补注[M].王先谦,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6]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范可旭)

Piloting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History of Han·Wu-hsing Chih* on Compilation of Official History

ZHAO Yi-cong

(Department of Social Education, Kaifeng Municipal Museum, Kaifeng 475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History of Han, Wu-hsing Chih* has been included in historical records as an important material when the official history was compiled, referring to Chapter *Shangshu·Hongfan* and the *History of Han·Wu-hsing Chih* style. The historians of later generations had mixed connotations about the *Wu-hsing Chih* as an official history. In view of the *Wu-hsing Chih* preaching the idea of imperial power, the rulers often adopted a praising attitude. Starting from the different eras of political thoughts since the Han Dynasty, and combining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past dynasties and comments made by historical reviewers, it helps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Wu-hsing Chih*, and combs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historians' viewpoints, in expectation of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History of Han·Wu-hsing Chih*.

Key words: *History of Han·Wu-hsing Chih*; Twenty-Four Histories; survey and research; compiling and writing